

是约翰·马歇尔对宪法最大的贡献。他主政最高法院期间,曾巧妙地申明这一控制原则,他说自己‘从未打算将司法权扩张至适当边界之外,更不准备将这项职权用到极致’。这也正是今日司法机构行使职权的现状。”^①

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使得美国司法部门真正成为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相互制衡的机构,极大地完善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为民众的法律信仰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不过正如上文所说,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在于最高法院对自己的定位和法官的自我谦抑,当最高法院越过这一原则而积极地进入政治丛林,以司法判决去处理政治议题时,难免遭遇失败。美国内战前最高法院试图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就奴隶制问题一锤定音,结果不仅加速了内战的爆发,也极大地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声望;该案不仅是司法越权的鲜明案例,也是最高法院史上最受诟病的案例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

金 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归结为“破”和“立”两个方面。所谓“破”,一方面是要摆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旧的保守主义原则的束缚,另一方面是要打破罗斯福新政以来自由主义势力长期把持美国政坛的局面;所谓“立”,一方面是要提出一套能够在新时代为大众接受的政治纲领,另一方面则是要寻找新的政治基地、政治载体和基层支持者,重新规划美国的政治格局。这也就是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在20世纪40—70年代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政治主张方面的变化

《韦伯斯特英语百科全书》对于“保守主义”一词的解释是“一种维持已经建立的东西并且鼓吹逐步发展而不是激烈变革的主张。”这个定义是相当含糊不清的,它仅仅表达了保守主义者看待事物的一般态度,并不是一个足以团结全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主张。实际上,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哲学分歧。总的来说,他们可以分成“传统主义者”(traditionist)和“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两个派别。

“传统主义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他们的基本信仰是进行有限的改革和“顺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激进的变革。因此,他们非常强调历史传统和经验的重要性。用拉塞尔·柯克的话说“政治变革只有与世代相传的被人们接受的公众舆论、宗教信仰,以及政治、道德、审美观相一致的时候,才能被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接受。”^②“传统主义者”认为确保社会的有序与和谐是追求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先决条件,他们相信,自由的概念与自我克制、服从以及对社会总体利益的责任感是密不可分的。而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秩序,“传统主义者”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社会干预,只要这种干预措施不会激烈地颠覆传统。

与“传统主义者”相反,“自由意志论者”的力量集中于工业发达的东北部地区,他们并不强调传统、和谐与秩序的重要性,而是严格信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自由意志论”的基本思

^① David M. O'Brien, *Judges on Judging: Views from the Bench*, CQ Press, 2013, p. 17.

^② Niels Bjerre-Poulsen, *Right Face: Organizing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1945-65*, Museum Tusulanum Pr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002, p. 15.

想是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有绝对的自主权,可以在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争取力所能及的最大成功。“自由意志论”者信奉洛克的观点,认为社会就是自由的个人直接缔结的“契约”。他们相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不依赖于传统和秩序,而是依赖自由竞争所激发出的巨大活力。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个人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好工具。

哲学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传统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之间在具体政策和主张方面大相径庭。自从美国内战以来,“自由意志论者”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20世纪30—40年代的萧条和战争向人们展现了政府调控在应对危机与确保社会公平方面的价值,彻底自由放任的思想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相反,在经济萧条和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面前,“传统主义者”那强调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主张却能够引起人们日益强烈的共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共和党“恢复原状”的呼声,到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共和党提出的“受够了吗”的问题,再到1968年大选中尼克松把自己塑造成“法律和秩序”的代表形象,都清楚地表现出了这种发展趋势。尽管在具体政策主张上,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似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比如他们仍然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要求减少(而不是取消)社会福利,但是这些主张的哲学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之所以维护自由竞争并不是因为他们将之视为社会进步的最佳途径,而是因为自由竞争是美国的历史传统。“传统主义者”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进行的政府调控是人为地将弱者提升到与强者平等的地位,从而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这样,美国保守主义的重点从“自由意志论”转移到了“传统主义”上面。

二、“红色恐慌”在美国保守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所谓“红色恐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美苏关系的恶化和冷战的爆发,席卷美国社会的歇斯底里的极端反共主义情绪。其实,反共主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20世纪美国的历史,但是二战后的“红色恐慌”却有其自身特点:它主要通过捏造和歪曲事实的做法,无限放大美苏之间的分歧以及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一度使反共几乎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唯一主题。二战后的“红色恐慌”一方面推动保守主义者自身加强联合,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打击自由主义势力的武器,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红色恐慌”中,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以搜捕“共产党同路人”(fellow-traveler)为名,把打击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势力。著名的保守主义杂志《自由人》里斯特·戴维斯给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所下的定义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倾向于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马克思主义那种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主义大杂烩,以及叛国行动难以区分地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并且声称它是“传统的美国和西方最大的敌人”。^①

有意思的是,保守主义者们利用“红色恐慌”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攻击是朝着两个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方向进行的。一方面,他们强调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声称它们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持有相同的哲学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相同的政治概念。哈耶克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声称,罗斯福新政式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集体主义”病症的两个不同阶段,如果听任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下去,最终形式就将是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自由市场经济的崩溃意味着美国人民将成为极权政府下的奴隶。^②保守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将自由主义和共产

^① Niels Bjerre-Poulsen, *Right Face: Organizing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1945-65*, p. 27.

^② 关于哈耶克的主张,详见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主义联系起来,能够有效地削弱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上的影响。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们也在强调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点,即自由主义者缺少共产主义者的那种责任心、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因此无法有效地承担起领导美国人民进行反共斗争的责任。自由主义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抛弃了美国的传统,而只能用“拜物主义”来弥补自己真实信仰的缺失。保守主义者们强调,要战胜共产主义,最好的方式就是坚持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正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所说的那样,对共产主义的最好防御就是“大胆的、明智的、传统的美利坚主义”。通过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们就为保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前者的目的在于削弱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上的影响,后者的目的在于强调保守主义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提高了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政坛上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反共旗帜下掩盖保守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加强保守主义势力内部的凝聚力。因此,“红色恐慌”在20世纪40—50年代极大地推进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日后许多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如巴里·戈德华特、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小威廉·巴克利等都是反共活动起家的。反过来,在保守主义者的推动下,美国的“红色恐慌”也日益高涨,最终发展到麦卡锡主义的顶峰。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一直都很清楚,以“红色恐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共主义有其局限性,尽管反共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外交政策领域,甚至一度成为它的主要方针,但是它并不能涵盖保守主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提出一整套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保守主义纲领。因此,当麦卡锡主义的衰落表明美国人对于极端泛化的反共主义已经开始感到厌恶的时候,保守主义势力的主流就开始果断地和它拉开距离。1965年,美国保守联盟代表大会拒绝了极端反共组织约翰·伯奇协会派代表参加大会的要求,理由是“你们协会的支配者们已经背弃了美国的原则,并且把这些原则斥之为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对当前美国面临的危机缺乏精确的分析。人们广泛认为,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和你们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①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保守主义者开始感到,一度被他们斥之为“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施政,也具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在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方面,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已经从“要不要”变成了“要多少”的问题。在这方面二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们表现出了根据具体环境对自身的政策主张和政治战略进行调整的能力,这是推动保守主义在二战后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打造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的努力

随着保守主义的重点从“自由意志论”向“传统主义”转变,它的政治基地也渐渐从东北部地区向着南部边缘地带转移。“南部边缘地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在《权势转移》一书中提出的。他从党派竞争的角度,将南部边缘地带定义为北纬37度线以南的13个州,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两州的南部地区。二战后由于新技术出现造成的经济转型,使美国的经济支柱从传统的重工业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过渡,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南部边缘地带。由此造成的就业格局变化吸引大批劳动力朝着南部边缘地带转移,造成当地人口大量增长。从而使得南部边缘地带无论在经济实力、人口数量还是政治重要性方面都迅速提高,对东北部地区构成巨大的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基地向南部边缘地带的转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和党势力在南部

^① Niels Bjerre-Poulsen, *Right Face: Organizing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1945-65*, pp. 205-206.

边缘地带迅速扩大。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导致了共和党控制东北部地区、民主党控制南部地区的传统美国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改变,而战后大批移民涌入南部边缘地带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共和党势力在东北部日趋衰落,相反在南部边缘地带它的势力却日益加强。1960—1972年,南部边缘地带在众议院里的议席数增加了17个,而南部边缘地带的共和党众议员却从21个增加到53个,翻了一倍以上。在参议院里,共和党势力的扩大还要惊人。1960—1974年,南部边缘地带在参议院中拥有的30个议席里,为共和党人所占据的席位从3席增加到11席,翻了两倍以上。1932—1965年,共和党在南部边缘地带总统选举的获胜率平均为15.8%,州长选举的获胜率为0,众议员选举的获胜率为4.5%,参议员选举的获胜率为0.7%,1965—1988年,这些数字相应地变为73.3%、26.9%、28.5%和31.3%。^①也就是说,在南部边缘地带,共和党虽然还没有成为多数党,但是它的势力已经牢固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共和党也日益意识到与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联合的重要性,这导致了所谓“国会保守联盟”的出现。在反对新政的斗争中,一方面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凸显出来,使他们感觉到了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原有的党派内部也发生分裂,保守派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民主党人日益分道扬镳,于是国会中传统的按照党派立场投票的情况出现了变化。1933年,参议院中的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开始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共同的投票立场。1934年,众议院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共和党与南方民主党人组成了“国会保守联盟”。1933—1980年,“国会保守联盟”在众议院中所占的比例则从来没有低于45%,在参议院中则从来没有低于40%。按照美国国会议事规则,这个比例足以阻止大多数重要法案的通过。而当保守联盟在国会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时候(这个比例出现于1947年,当时保守联盟在众议院中所占比例为82.99%,在参议院中为78.12%)^②,保守主义势力几乎能够让国会通过任何自己想要的法案。于是,一个以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联合组成的新的保守主义政治载体就形成了。

与此同时,中下层美国人中间的保守主义倾向也不断加强。“中下层美国人”是一个含糊的定义,政治科学家威廉·希克森将它表述为“最广泛地包括所有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白人的集合体,其中心力量在于蓝领工人上层、白领工人下层和自己经营的小业主”。^③“红色恐慌”时期的反共主义固然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对于自由主义的恐惧,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近200年的历史中,美国已经牢固地树立起了强调个人主动精神的传统,对看似与这一传统相悖的东西,美国人都会在潜意识里抱有抵触情绪。为了渡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危机时刻,他们可以容忍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某些干预,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他们仍然会希望尽可能不受干预地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个人能力所及的最大成功。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更像是一种令他们深感不快而急于想要摆脱的施舍。这就导致中下层美国人对于新政式自由主义持对立的立场。

另一方面,随着民主党政府所奉行的新政式自由主义施政日益深入,中下层美国人开始感到自己沦为其牺牲品。他们既要不得不承受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负担,政府对弱势群体(穷人和少数民族)的扶植也使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这些小商人、农场主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南部边缘地带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在1946年的选举中选出了新政以来第一届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

① 梅孜《美国政治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6页。

② Mack C. Shelley II, *The Permanent Majority: The Conservative Coal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p. 130—131, 142—143.

③ Robert Manson, *Richard Nix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Majorit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p. 43.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下阶层美国人的保守主义倾向日益加强的趋势在校园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理查德·G. 布朗加特则把保守主义学生团体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的成员身份与著名的激进组织学生争取民主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做了对比,发现后者的成员中,出身工人背景家庭的只有 17%,出身上中层阶级家庭的成员占 55%;而前者的成员中,出身工人背景家庭的占到 39%。出身上中层阶级家庭的成员只有 28%。^① 布朗加特的研究还发现,在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的成员中,真正的骨干力量在于天主教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信奉的是“传统主义”式的保守主义。这批人构成了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青年骨干。

这种发展趋势立刻引起了两党政治分析家的关注。共和党人凯文·菲利普斯在《中等阶层美国人和正在出现的共和党多数》一书中指出,一个新的大联盟正在形成,它包括在 1968 年大选中所有未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菲利普斯声称,共和党不需要黑人和东北部自由主义者的选票,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所有持保守观点的中等阶层美国人。^② 无独有偶,民主党分析家理查德·斯卡蒙和本·沃登堡也在《真正的多数》一书中也得出结论,哪个党能够认识到“美国选民的大多数不是年轻人,不是黑人,不是穷人,而是中年人,中等阶层和持温和观点的人”,它就能取得未来大选的胜利。^③ 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8 年的大选中作为“法律和秩序”代表的形象出现,正好能够符合中下层美国人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中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群等各种反传统现象的担忧,从而成为他在大选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经过 20 世纪 40—60 年代的发展,一个以南部边缘地带为主要政治基地、以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联盟为主要政治载体、以中下层美国人为主要政治支持者的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最终形成,这构成了二战后美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甚至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被迫辞职也只是暂时遏制而未能完全扭转这个趋势。在罗纳德·里根在 1980 年上台之后,“美国向右转”就已成定局,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责任编辑:金海)

(责任校对:景德祥)

① Niels Bjerre-Poulsen *Right Face: Organizing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1945-65*, pp. 165-166.

② Kevin P. Phillips, *Middle America and 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Staff Member and Office Files, Harry S. Dent, box 8,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③ Richard M. Scammon and Ben J. Wattenberg, *The Real Majority*, Coward-McCann, 1970, pp. 35-58.